

出現中的市民社會 及其限制

● 王振寰

前 言

在很多的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中，中國社會是一個東方專制社會，即國家機器(the state)凌駕在社會之上，而社會則缺乏自主自發的活力。在這樣的生產方式中，國家機器攝取了以及集中了社會大部分的資源，因此國家機器的威權統治在社會中很少受到挑戰。傳統中國王朝的統治，不允許社會中存在可能會挑戰其權威的權力中心，因此一旦有這個可能性存在，王朝亦會將此可能性除去。這個可能是傳統中國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原因之一。而傳統中國的朝代變化的模式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然而即使改朝換代，新崛起的王朝仍然承繼了既有的統治模式，集中社會的資源，和壓制社會可能的自主動力。簡單地說，傳統中國缺乏西方意義下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缺乏社會自主的動力，能够監督和影響國家機器，以及缺乏能够產生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①。

在西方，由於市民社會的崛起，打破了貴族的統治，而建立了近代民主社會的基礎。西方的市民社會是奠基於城市居民的自治，城市中產階級對公共事物的熱心參與和自由結社，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對個人權利的執着，以及對公共領域生活的關心等。正因為這種個人主義，社區自治，和自由結社的傳統，使得市民社會得以發展出不同於國家機器的思想和政治理念來。因此，社會學家韋伯(Weber)，涂爾幹(Durkheim)，以及托克維爾(Tocqueville)都指出了，市民社會中的自治與自由結社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②。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的社會似乎逐漸脫離傳統中國的社會發展模式，而開始發展出與國家機器不同的社會自主的動力。在政治的面向上，反對運動仍然維持動員的力量，而在1986成立了反對黨。在社會的面向上，不同的



圖 面對反叛的運動的思潮時，國民黨的國家機器仍然和傳統中國大一統的統治方式一樣，以壓制的方式對待。然而經常的，這些壓制並不會產生多大的效果。

社會運動出現，從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到勞工運動等。而在文化面向上，也出現了黨外雜誌，對體制批判的雜誌和期刊，以及介紹西方左右派最新思想的刊物。這些運動和思想潮流在1980年代以前的台灣是無法想像的。在面對這些反叛的運動的思潮時，國民黨的國家機器仍然和傳統中國的大一統的統治方式一樣，以壓制的方式對待。然而經常的，這些壓制並不會產生多大的效果。而結果是，國家採取了妥協的方式，允許這些反體制的運動的思潮繼續存在，國家機器似乎一步步地被社會拉着走，社會的新要求和新思想不斷地衝擊着老大而缺乏動力的國家機器。而其中最大的轉變，當然是1987年的解嚴，承認已經於1986年9月成立的反對黨，以及使得威權體制作實質上的自由化^③。

乍看之下，台灣社會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似乎出現了類似西方的市民社會，社會有自主的要求，發展出與國家機器不同的想法，而且還透過社會運動或其他方式影響和監督政治的運作。這個表面的類似是否代表了台灣開始出現了所謂的市民社會？台灣是否可能發展出自主的社會組織原則，創造出自由自主的公共空間，監督國家機器，進而在很多的政策上，對國家有決定性的影響？

本文的目的在回答：「台灣是否出現了自我組織的市民社會」這個問題。本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審慎的樂觀，一方面我們觀察到台灣社會的轉變，但另一方面由於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原因，台灣社會的自我組織能力相當的脆弱，而與西方市民社會具有的堅實社會基礎不同。本文的分析將首先討論，(1)台灣現有的市民社會特質以及分析它出現的原因；(2)比較台灣社會的特質與西方市民社會的不同和為甚麼不同；(3)分析台灣出現市民社會的一些限制條件；以及最後，指出台灣維繫自我組織的社會的可能性為何。

市民社會在台灣

台灣社會產生「質」的變化應該是在1980年代，特別是1980年代的中期以後。在這個時期，政治反對運動蓬勃發展，而各種類型的社會運動亦不斷的出現。同時，在思想、文化和藝術領域，各種創新的觀點和作法亦不斷出現而衝擊着這個社會。老舊的國家機器依然企圖壓制這些新的事物和思想，然而它已經失去了壓制的能力。社會逐漸發展出自主的組織和不同的理念。

更重要的是，由於社會政治運動的崛起，而使得衝突明朗化和逐漸的制度化。不同利益和理念團體的出現使得衝突不可避免，而在國家機器無法再強力干預的情況下，社會團體之間開始學習容忍不同的理念和意見，而且開始學習以討論和協議的方式解決問題。這個情況的出現，使得台灣社會逐漸走出傳統中國的大一統及有異議就是不團結的心態。台灣社會的人們逐漸認知到，當他們無法說服和壓制對方時，只好承認對方，並以互相妥協的方式來共存。而共存需要利益和理念的溝通和協商，在這過程中也逐漸發展出程序和規則出來。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互動模式，從前者壓制後者，到承認，到近來的協商就是一個例子。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種衝突的制度化現象只是開始出現而已，至於相關的程序和規則的建立，必須莫基於對對方完全尊重的原則，在今天的台灣仍未確立。自由派學者稱此為共識(consensus)的缺乏，而左派學者稱此為資產階級仍未具有霸權(hegemony)。

使得台灣社會發生巨大動力的結構性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個則是國民黨統治霸權的瓦解^④。

正如馬克思和韋伯都指出來的，資本主義解放了舊有的社會關係，使得人成為個體，而這個個體化使得新的自主結社和由於個人利益或理念相同而產生的聯盟成為可能。而生產力的增加和進步，使得人類得以不再為物質稀少所苦，而有剩餘的時間和精力來從事政治和社會的事物。因此政治的民主與生產力的進步有一定的相關性，雖然二者未必有因果關係。自由派學者Lipset的古典研究指出這個現象，而左派學者Poulantzas也認為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宰制的最佳的偽裝^⑤。

80年代台灣社會的活動力基本上可以看成為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資本主義的擴張，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村移民到都市，接受了都市文化的洗禮，而這有利於傳統價值觀的拋棄。由於工業化不斷的持續，也使得都市中產階級大

在國家機器無法再強力干預的情況下，社會團體之間開始學習容忍不同的理念和意見，而且開始學習以討論和協議的方式解決問題。這個情況的出現，使得台灣社會逐漸走出傳統中國的大一統及有異議就是不團結的心態。

量的出現，而這也有利於新事物的開展。更重要的是，由於台灣資本主義的順利開展，使得國民所得不斷的增加，使得人民有餘力從事非物質生產性的工作，如反對運動，思想文化的創新，和社會運動等。由於社會的崛起，台灣社會在80年代展現了較為多元的面貌。

所謂統治霸權的危機是指國民黨的統治所依賴的意識形態逐漸失去說服力，而且其政治的控制能力亦失去效力而言。國民黨國家機器統治霸權的危機來自兩個原因，其一是來自政治反對運動的挑戰，它使得國民黨的政治意識形態失去正當性，而在80年代初期國民黨的意識形態霸權已經出現危機的徵兆；另一則是來自蔣經國總統逝世後國民黨黨內的鬥爭，而這使得國民黨無力壓制社會運動。

反對運動對80年代的台灣社會而言有二意義，一是打破了國民黨政府的大中國意識形態及其衍生的威權統治方式，二是創造了社會運動和反對文化等自主力量的生存空間。國民黨政府的統治霸權，在1970年代中期開始受到反對運動的挑戰。反對運動挑戰戒嚴體制，挑戰不改選的國會，挑戰一黨專政，以及挑戰國民黨的大中國心態忽略台灣的民意等。國民黨政府則不斷地壓制這些言論和說法。而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國民黨政府以暴力鎮壓反對運動，並將反對運動人士逮捕入獄。

然而這個鎮壓在80年代卻引起更大的反彈。反對運動人士的家屬在80年代初期的選舉中，反而都得到更大的支持。由這個鎮壓和反彈，代表了社會對反對運動的接受，而這也間接使得國民黨政府後來在面對反對運動和反對文化時，不敢採取強制鎮壓的作法。這個生存空間的加大，使得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加入反對運動，以及使得社會運動逐漸出現。

除了反對運動的原因外，國民黨統治霸權本身的瓦解亦是使得社會得以出現的重要因素。蔣經國總統的逝世與此有直接的關係。由於強人的逝世使得國民黨黨內的鬥爭明朗化，不論是保守勢力、務實派，或由於不同的意識形態所形成的勢力，為了奪取權力而相互鬥爭，也各自在社會中尋找其支持者。這個黨內的鬥爭使得國民黨的內聚力逐漸崩潰，並相互的批評和形成了與國民黨中央不同的派系和社會動員。也因此國民黨政府在1987年以後所面對的不只是社會的挑戰，而且也面對着黨內不同派系的挑戰。國民黨的統治霸權至此乃分崩離析。在此情況下，國民黨政府也就不再能正當的壓制反對它的社會力量。而此間接地有助於政治和社會的多元化。

國民黨統治霸權的分崩離析以及反對運動的強力挑戰，使得社會對政治參與害怕的程度減低，社會運動因此較有機會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在以前很少的知識分子投入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而現在則有愈來愈多知識分子投入社會的改造運動中；在以前很少有資本家公開批評政府的政策或支持社會運動及反對運動，現在已經開始有這個迹象，如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的成立就是一個例子；而愈來愈多的基金會成立，企圖透過對政府的壓力而制定有利於其團體的政策出來，亦是使得社會得以逐展發展自主性的機制，如環保團體、婦女運動團體與消費者團體等成立的基金會等。這些新資源的加入，使得原來資源稀少的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有了更大的生機和動員能力，也使得市民社會需要的自

反對運動對80年代的台灣社會而言有二意義，一是打破了國民黨政府的大中國意識形態及其衍生的威權統治方式，二是創造了社會運動和反對文化等自主力量的生存空間。

主力量逐漸的成長。

雖然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國民黨統治霸權的瓦解有助於市民社會的崛起，而我們也的確觀察到了台灣社會在80年代以後所展現的活力。然而由這些迹象，我們是否能由此認為台灣將會產生類似西方意義下，具有自我組織原則的市民社會？

台灣社會與西方市民社會的不同

在古典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市民社會的出現，城市的中產階級有着主導性的關係。由於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使得舊有的生產方式和統治方式瓦解，資本主義社會的活力因此得以展現。更重要的是，這使得民主政治的出現和維繫有了社會基礎。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只推翻了貴族政治，而且也得到了工人階級的認同，而使得馬克思的預言失敗。以葛蘭西（Gramsci）的話來說，西方市民社會是莫基於資產階級的霸權（hegemony）^⑥。在台灣，到底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在社會裏扮演甚麼角色，而下層社會的群體又扮演甚麼角色？

國家資本主義下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

莫爾（Barrington Moore）曾經指出，假如沒有資產階級，則民主是無法想像的^⑦。的確，從歷史的發展中，我們是可以發現到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的相關性。而這個發展，城市的中產階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馬克思與韋伯的古典研究都指出了城市中產階級的這個角色。然而，在研究經濟發展的衆多社會學文獻裏大多指出，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發展類型與古典資本主義有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動力來自私人資本，因此它會對抗以地主階級為首的國家機器。而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其動力則來自國家機器，資本家的出現是靠國家的政策扶植的，因此資本家的利益與國家機器是一致的，所以它缺乏像西方古典資本主義裏的資產階級般的與國家機器對立的特質。資產階級在第三世界是軟弱和依賴性的，也因此，它不會扮演像西方資產階級一樣爭取政治民主的角色。一位發展學者甚至指出，在第三世界裏，資本家是國家的兒子^⑧。

在這個面向上，台灣的情況與其他第三世界並無多大的不同。也因此台灣的資本家和中產階級在台灣社會中，並不具備像西方社會裏所具有的積極角色，它們所扮演的反而是國家的支持者及其社會基礎的角色。它們的消極性與台灣經濟社會的發展有直接的相關。

國民黨政府來台初期的50年代，主要的政策方針是政治上求安定，經濟上求穩定。因此以戒嚴體制來維持政治上的安定，而在經濟上則以進口取代工業化政策來維持民生工業。在政策的帶領下，台灣後來出現的大財團很多是在這個時期發迹的。由於進口取代工業化發展的產業都是以國內市場為主，例如紡織、水泥、食品加工、塑膠等，由於國家的極力保護，這些產業後來大多成為

資產階級在第三世界是軟弱和依賴的，資本家是國家的兒子，它不會扮演像西方資產階級一樣爭取政治民主的角色。

大企業，而且生產的產品基本上也是以內銷為主。台灣的第一代資本家也在這個時期逐漸出現。

不過影響台灣經濟社會最大的是1960年的19點經濟改革計劃，將台灣開放給世界市場。從此，台灣成為世界市場分工的一部分，生產簡單加工的工業產品。而後來佔企業絕大部分的中小企業也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這些企業與後來的壟斷性大財團的不同，在於它們生產的產品是為了國際市場，而大財團則是以國內市場為主。而在工商業的上游，例如水電、石化、銀行等，則全部國營（這個現象在1991以後會有變化）。因此雖然公營企業在工商業生產上佔的分量並不大，然而卻都是影響企業巨大的產業。

由於企業的分工，使得國家機器對大中小企業的影響，即使不用政治上的力量，也可以透過經濟資源的分配而使得企業對國家政策不敢違背。而市場的因素也使得台灣的資本家更加的依賴國民黨政府。壟斷性企業的分割國內市場依賴的是政府的保護政策，使國外的相同但價格低廉的產品無法進入國內市場。而中小企業的產品要能在國際市場上和別的国家產品競爭，需要的是低廉的勞動力，國民黨政府的戒嚴體制對勞工結社和罷工權的限制，有利於中小企業降低生產成本。

因此，在利益上台灣的資本家與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是一致的。這也是為甚麼我們很少見到台灣的資本家公開支持反對運動的原因（也許有個別資本家秘密地支持反對運動，但這並不影響這裏的論證），也可以了解為甚麼台灣的資本家在台灣政治自由化的過程裏，扮演如此小的角色。

至於白領的中產階級，其出現與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其利益也與既有的體制是一致的。因此其政治態度傾向支持能夠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為。從現有的調查資料顯示，台灣的白領中產階級很少支持反對黨，更少支持社會運動。雖然他們未必支持國民黨的政策，但是其對政治的冷漠無助於改革，反而有利保守勢力。這也同時表示白領的中產階級並不具有對社會自治的要求。由於台灣的資本家和中產階級的依賴性格，使得它們對社會自治的要求並不高，也不會對抗國家機器的統治。讓國民黨統治霸權鬆動的力量是來自民衆部門(popular sectors)。

發展主義下的民衆部門

台灣社會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不論是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都在國民黨國家機器的監督之下。而在1970年代中期之後，政治反對運動開始出現，形成挑戰國家權威的勢力。80年代以後，社會運動開始出現，雖然社會運動的本質未必是政治性的，但是在戒嚴體制下，由於國家機器對社會的干預，以及社會運動和政治反對運動的互相滲透，使得許多的社會運動呈現了政治的特性。因此，在解嚴之前，政治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共同形成了民主運動的主要力量。而以現有的資料而言，不論是政治反對運動或社會運動，其主要的支持者均來自民衆部門，包括工人，農民等弱勢團體，以及小部分的中產階級^②。為甚麼民衆部門是社會和政治運動的主要支持者？

台灣白領的中產階級，其利益也與既有的體制是一致的。雖然他們未必支持國民黨的政策，但是其對政治的冷漠無助於改革，反而有利於保守的勢力。

在台灣不論是政治反對運動或社會運動，其主要的支持者均來自民衆部門，包括工人，農民等弱勢團體，以及小部分的中產階級。



圖 台灣市民社會的特質是由民眾部門創造出來的，國家機器和中上階級只是被迫妥協，而由於民眾部門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創造文化霸權，因此台灣的市民社會並不具有類似西方社會的共同價值觀。

正如上述，台灣的經濟發展是在國家的引導下進行的，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色與其他第三世界開始工業化時的情況並無多大的不同，即，在世界分工下，生產簡單加工附加價值低的工業產品。而這樣的工業化之特色是，必須維持低工資，低成本，和不必考慮社會成本的。在強調發展而不考慮社會成本的政策導引下，台灣的經濟發展確實是十分的快速，然而也付出了社會代價。這些社會成本和代價包括了：高度的污染，剝奪了勞動的結社和罷工權，對弱勢團體權益的忽略，以及不允許影響社會秩序和生產的社會結社和活動等等。

當然對這些社會群體權益的剝奪，未必來自經濟發展的要求，而是與戒嚴體制有密切的相關。但是無可否認的，對弱勢團體權益的剝奪有利於經濟發展。這些弱勢群體在1980年代中期前後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主要力量，也成為政治反對運動的主要支持者。在1987年的解除戒嚴之前，弱勢團體的社會運動與政治反對運動共同構成了壓迫國民黨政治自由化的主要力量。而在解嚴之後，雖然二者在功能上有所分化，一是社會層面的運動而另一則是政治層次的，但是在鬆動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的意義上，卻仍是一致的。

由上所述，具有資源的資本家和中產階級基本上是保守和支持既有體制的，而想要改變既有體制的反而是來自資源較少的民眾部門。在這個拉鋸戰中，前者愈來愈佔了上風。1990年郝柏村的執政，將80年代以來由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所爭來的權利逐漸收回中央，以行政的效率替代政治協商，而使得民主的空間逐漸退縮。如此的強力政治卻得到大量的支持，其中主要的支持力量來自資本家和中產階級。它們形成了郝柏村內閣的主要社會基礎。換言之，與西方市民社會不同的是，台灣社會的都市的中產階級和資本家並不要求自主自治，而強烈地依賴國家機器。以布洛克（Block）的話來說，這正是統治階級並不統治。或以Zeitlin的話來描述，台灣社會是沒有資產階級文化霸權（hegemony）的資本主義社會^⑩。

台灣社會面臨的限制與可能性

與西方市民社會相同的是，台灣社會開始發展出自我組織及自治的原則和基礎。不過與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的市民社會基於資產階級的霸權，資產階級有能力將物質利益分給工人和社會，並將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社會各部門；而台灣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並不具有這樣的能力，它們毋寧是依賴國家機器來維持其利益，而缺乏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更不用說要將其利益和價值觀擴散到整個社會。台灣市民社會的特質是由民衆部門創造出來的，國家機器和中上階級只是被迫妥協，而由於民衆部門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創造文化霸權，因此台灣的市民社會並不具有類似西方社會的共同價值觀。換言之，它並沒有可以將各個不同的社會部門結合在一起的「水泥」^①。在此情況下，台灣市民社會是脆弱的。以下我們分經濟的，意識形態的，以及政治的，這三方面來討論台灣市民社會的脆弱性。

與西方市民社會不同的是，台灣社會的都市的中產階級和資本家並不要求自主自治，而強烈地依賴國家機器。與西方市民社會相同的是，台灣社會開始發展出自我組織及自治的原則和基礎。

在經濟條件上，最明顯的限制條件，就是台灣邊陲資本主義的特質：經濟高度依賴國外市場，以及生產簡單加工的工業產品。這些特質，使得台灣的經濟體系很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景氣波動的影響。經濟景氣時，民衆部門容易得到資源，因此也較容易動員。而且從80年代後期的發展來看，當經濟景氣和客觀政治條件容許時，中上階級也許會支持與其利益不直接有關的社會運動，如環保運動；然而當景氣低落或社會運動影響到其經濟利益時，它們就可能要求國家出面來維持社會政治秩序或要求以國家的力量來降低生產成本了。而在此情況下，民衆部門的動員不只面臨資源的缺乏，而且有來自政治鎮壓的可能性。而這將不利於市民社會自主特質的發展。

從這個角度而言，要維繫台灣市民社會的自主特質，就必須能夠走出邊陲資本主義的架構，發展出國內市場和能夠生產高度附加價值的產品。如此的話，一方面國內經濟較不會受到國際不可知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利潤較高，使得資本家較不依賴國家機器，而且有剩餘可以分給社會和工人，而使得社會較有發展自主組織的物質基礎。在這個面向上，台灣還在尋找出路，而且還未確定其發展的前景，因此在物質條件上，我們還沒看到維繫現有基礎穩定成長的可能性。

在意識形態上，中國長期以來的威權政治文化深入社會各角落，對社會自我組織的形成造成強大的阻礙。在日常生活的休閒活動，媒體的連續劇，以及教育體系裏，傳統威權統治的特質已深入社會人心。因此對聖君賢相的期盼，更勝於對自己的要求，及更勝於要求自己來改變政治社會的事實。另一方面，長期的戒嚴體制，使得人民害怕參與政治，和害怕政治權威，而這同樣不利於社會的民主化。戒嚴時期對政治反對人士的鎮壓，使得人民對政治產生了害怕和冷漠的態度。中產階級家庭更是要求其子女不能參與政治，要不然就是把子女送到國外移民，離開這個地方。而假如他們或其子女真的對政治很有興趣，那麼他們會選擇加入國民黨，透過了這個系統進入體制，強化自己的利益，同時也強化了這個威權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

傳統威權的意識形態之所以仍然是這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代表着這個社會結構中，傳統社會群體仍然是主要的統治群體。因此要改造如此的意識形態並不容易。新的意識形態，例如社會自治與個人主義，總是跟隨着新的社會群體的出現而出現，而它是否能够成為主流則與新的社會群體能否成為主要群體，和將其意識形態轉變為社會大眾接受的意識形態有關了。然而由於台灣的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並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而挑戰權威的民眾部門由於缺乏資源和能力，並不可能形成取代既有的不同類型的意識形態。因此以葛蘭西的話來說，現在是「舊有的權威已經瓦解，而新的權威仍未建立的時期」^⑩。因此與經濟的條件一樣，意識形態這個因素仍然不能確定現有的發展。

在政治條件上，台灣社會有一個很重要的限制條件，那就是與中國大陸共產政權的對峙。由於大陸共產政權從未正式宣告放棄對台灣的主權，台灣社會的問題因此很難不去考慮大陸政權的反應。在冷戰時期，這種國共對峙使得國民黨用盡各種方式壓制社會，使得社會失去自主自發的活動力；而在國共對峙和緩的今天，對大陸政權的害怕，使得社會任何自主的努力都或多或少會受到大陸政權回應的影響，而這更不利於社會內的自主性的全面發展。

政治條件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即是國家認同的危機。台灣政治的特殊性在於其社會與其國家機器之間的不一致性，即政府宣稱認同的領域與其實際統治的領域不同，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很少見的。這個矛盾使得台灣社會至今還沒有一個清楚的認同對象，到底是中國或是台灣。而這個認同的危機造成了嚴重的政治社會衝突。國民黨政府仍然認同中國，因此要維持部分的既有體制而沒有大幅度的民主化；而民進黨的認同台灣，使得它要求政治的全面民主化，拒絕國民黨以統一的志業為藉口來緩和民主化的腳步；甚至在社會運動裏，由於認同的矛盾，也使得社會運動之間無法團結而分化和對立。在國家認同危機未得到解決之前，社會自主性對大部分人而言似乎顯得並不重要。

從這個角度而言，國共的對峙以及國家認同的危機假如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則台灣社會之自主性的發展將受到很大的阻礙。與前面的兩個條件相比，政治這個面向是更不能確定的，因為台灣政治的前景不完全是由這個社會的人民自己作決定，而牽涉到對面的共產政權的作為。

因此，從以上的討論，台灣社會自主性的發展是出現了，然而它仍然脆弱，因為維繫它持續發展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條件，還不够清楚和確定。而我們唯一能够確定的是，至今為止，台灣社會的自主性和自我發展性還在持續的擴張，這對台灣社會的人民而言是件好事，至少我們走出了傳統中國的威權政治，往更民主的社會前進。這樣的社會形態和發展方向是這裏的人民付出代價爭取和創造而來的。

結 論

本文回答的問題是：台灣社會在80年代中期以後的發展，是否是西方意義下的市民社會？我們的答案是：一方面台灣社會已經發展出了自我組織的發展

傳統威權的意識形態之所以仍然是這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代表着這個社會結構中，傳統社會群體仍然是主要的統治群體。

國共的對峙以及國家認同的危機假如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則台灣社會之自主性的發展將受到很大的阻礙。

形態，而且是在持續的發展之中；但是另一方面，台灣社會仍然缺乏類似西方社會所具有的共同價值觀來整合社會不同的群體，因此台灣社會仍然脆弱。而在未來的發展上，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在維繫社會自我組織和自主性的原則上，其前景仍不清楚，這是台灣社會的脆弱性的來源。不過至今為止，台灣社會自我發展的情況仍然樂觀，新的思潮，新的社會結社，新的社會要求不斷出現。社會正在學習自主，學習溝通，和學習透過衝突而建立一些規則和程序。它正在跳出傳統中國大一統的陷阱。

從邏輯上而言，國家機器有可能自動地給與社會較大的自主空間。然而從實際歷史的發展來看，這種空間的獲得都是靠人民流血流汗得到的。台灣80年代的歷史就是一個見證。台灣的人民正在寫中國歷史中嶄新的一頁，它是屬於台灣社會的。

註釋

① 市民社會的觀念在西方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基本上我們可以將之分成四類。(1)有些學者將市民社會等同於國家機器，而認為在前國家(pre-state)階段是自然狀態，國家的興起建立了法律和規則，使自然狀態成為有規則可循。而市民社會就是國家建立之後之有規則的社會。這個觀點的代表是Hobbes, Locke等。(2)黑格爾的觀點並不認為前國家的階段是自然狀態，而認為市民社會是國家統合的目標。市民社會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它的特色是社會中的個人是孤立貪婪和對立的。國家的興起是超越這種生活方式，而達成倫理生活和經濟生活的統一。(3)馬克思反對黑格爾的觀點，而認為市民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其特色是人與人之間的對立，人和自然的對立，異化，和剝削等。但馬克思並不認為要有國家的崛起來統合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而是認為需要有不同的生產方式來超越既有的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的觀點將市民社會化約到資本主義社會，只強調經濟面，使得他忽略了西方社會中，自由結社，都市自治，和社會自我組織的特性。(4)這個觀點是本文採取的觀點，認為市民社會具有社會生活自主的面向，社會的自主性並不依賴國家的干預和保證。相反的，這個觀點擔心國家的過度干預將阻礙社會的發展。民主社會的發展需要社會自主性的擴張和發展。這個觀點的代表有Tocqueville, Weber, Durkheim等。有關國家和市民社會的關係的著作近來出版相當多。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1988)及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這兩本書是很好的入門著作。

②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中有關都市的部分。及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Y: Free Press, 1964)以及, Alexis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Y: Doubledays, 1969)。

③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3, 頁71-116(1989)。亦見，王振寰：〈詭譎的九〇年代社會圖像〉《中國論壇》，343:19-25(1990)。

④ 依Dahl的定義，一個具有統治霸權的政體為「一個政府，它只對某一個人(或一個小而完全聚合的少數派)的喜好作政治上的反應，而忽略或不顧其他人的喜好」。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統治完全符合Dahl的定義。Robert Dahl, "Governments and Oppositions," in Fred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ish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3 (Mass: Readings, 1977), p. 118.

- ⑤ 自由派觀點見S. Lipset, *Political Man* (NY: Doubledays, 1963)。左派觀點見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Y: Monthly Review, 1971)和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Verso, 1978)。
- ⑥⑫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Y: International, 1971)。中文翻譯：《獄中札記》，頁181 (台北：谷風，1988)。
- ⑦ Barrington Moore, Jr.,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Boston: Beacon, 1966), p. 418.
- ⑧ Jose Reyna, "Redefining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J. Reyna and R. Weinert eds, *Authoritarianism in Mexico* (Philadelphia, P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7), pp. 155-172。亦參考 F. Cardoso and E. Falle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及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⑨ 林佳龍：〈威權待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 117-144。亦參考張茂桂《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二版，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90。
- ⑩ Fred Block,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Socialist Revolution*, 33: 7-28 (1977)。Maurice Zeitlin, *Civil Wars in Chi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⑪ 有關的討論見Micheal Mann, "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423-439 (1970)。

王振寰 1956年生，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社會學博士，現任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台灣社會研究》編委，著有〈反對運動與台灣的政治轉型〉、〈國家、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等論文多篇。